



北大哲学门经典文萃

主编 陈 来

熊十力 选集

XIONGSHILIXUANJI

景海峰 / 编



中国哲学的阐释
西方哲学的透视
哲学体系的创建
20世纪中国哲学大师
20世纪中国哲学经典之作
20世纪中国哲学成就标志

吉林人民出版社

熊十力选集

景海峰 / 编

熊十力选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哲学门经典文萃.熊十力选集/陈来主编;熊十力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5

ISBN 7-206-04678-9

I.北… II.①陈… ②熊… III.熊十力(1884~1968)—哲学思想

IV.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3366 号

熊十力选集

著 者:熊十力

编 者:景海峰

策划编辑:徐家康

责任编辑:崔 凯

封面设计:沈 赫

责任校对:校 科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5395846

印 刷: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970mm 1/16

印 张:33 字 数:54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678-9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 000 册

定 价: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在 20 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北京大学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建立的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自新文化运动初期以后，更成为全国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的中心，在 20 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1898 年京师大学堂建立以后，本设有经学、诸子学、理学等传统哲学课程，但未立“哲学”之名。1912 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学科设置改革，乃明确建立文科“哲学门”，至 1919 年，哲学门改称“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是中国近代大学所建立的第一个哲学系，自北大哲学门 1914 年正式招生，至 2004 年，北大哲学系的建系历史已经走过整整 90 年。

20 世纪中国的哲学教育与哲学研究的发展，和北京大学哲学系结下了不解之缘。自北大哲学门建立以来，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梁漱溟、熊十力、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唐钺、邓以蛰、宗白华、朱光潜、冯定、陈康、贺麟、洪谦、朱谦之、张岱年等著名学者都曾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可以说，20 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绝大多数都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有关，而他们当之无愧地是 20 世纪中国哲学界所拥有的自己的大师。这些大师中的任何一位，若在全国其他大学的哲学系，都可以成为这一大学足以为傲的光环；而北京大学哲学系曾拥有如此众多的大师，也就使北大哲学系拥有了其他大学难以相比的得天独厚的资源。正是这些大师们，使得 20 世纪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对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北大哲学系 90 年的发展史即是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史的缩影。

北大哲学系的这种地位也是历史地形成的。民国初年从北京大学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使得它成为全国思想文化的中心；抗战期间，北大与清华、南开合为西南联合大学，成为全国高等教育的中心；1952 年院系调整，把当时全国大学的哲学系都集中在北京大学，成为全国大学唯一的哲学系。1956 年以后，北大哲学系不断调出教师，或接受进修，积

极参与了各地大学哲学系或哲学专业的重建或新建，以及哲学研究所的成立，而且在相当一个时期里，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成为了全国各大学哲学系教师队伍和哲学专业人员的重要培养来源。这一切使得这些哲学教育与学术的单位，在哲学教育和学术研究上，不同程度地以北大哲学系为楷模，受到北大哲学系的深刻影响。

另一方面，在上述历史变化的过程中，北大哲学系由于不断吸收清华大学哲学系和来自全国其他哲学系的营养，丰富和壮大了自己的发展，培养起了哲学学科兼容并包、多元发展的风气和心态。在研究方法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北大哲学系在胡适、汤用彤的影响下，形成了重视哲学史研究的风气和传统，而清华大学哲学系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发展中，以冯友兰、金岳霖为代表，渐渐形成了重视逻辑分析方法的哲学传统。在哲学体系上，北大的熊十力、梁漱溟、贺麟的哲学思想都与中国传统的“心学”关系密切，而清华的冯友兰、金岳霖的哲学思想都与中国传统的“理学”接近。经过西南联大的合作和院系调整的合并，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北大哲学系，融合了不同的学术追求，兼重思想资料和哲学分析，在哲学思想和学术研究上，基础更加宽厚，力量更加充实，研究更为多样。当然，今天北大哲学系的传统，不仅仅是融合了来自其他大学的传统和优长，其自身也历经了种种的发展。如1949年以后，与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样，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者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洗礼，在理论素养和研究品质上有了进一步提高，从而，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和理解，结合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获得了以前不可能有的成绩，在各个学科方向上也丰富了自身研究的传统。

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密切联系，除了北京大学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形成的地位、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变迁、中国与世界文化的不断融合等历史的和外在的因素之外，也揭示出现代哲学的发展与大学建制的牢固结缘。从世界历史来看，近代社会与制度变迁给哲学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哲学的主要舞台转移到近代意义上的大学，转到以大学为主的现代教育、科研体制中来，这使得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性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大为发展。事实上，康德以来的西方哲学家无不以大学为其讲学著述的依托。所以，尽管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中仍有不满于学院体制或倾向于游离学院体制之外的人，但绝大多数哲学家

和研究哲学的学者都不可能与大学绝缘，因为大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提供哲学基础教育和哲学理论研究环境的基本体制。哲学与大学的这种密切关联，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其结果是，哲学作为大学分科之一在近代教育体制中获得一席稳固的地位，而哲学家也成为专业化的哲学教授。上面提到的 20 世纪中国哲学家，他们的哲学研究工作，和他们的哲学体系的建立，也大都都在大学之中。即使是最倾向于学院外体制的梁漱溟和熊十力，他们的名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新唯识论》也都是任教北大哲学系时期完成的。哲学与大学的这种关系，从一个方面标志了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的时代的分野，同时也不能不对哲学发展的本身造成影响。

本系列收入了十位 20 世纪曾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中国哲学家的研究著作，即胡适、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朱谦之、贺麟、洪谦、张岱年。这些哲学家的著述，如果参照 50 多年前贺麟所总结的中国哲学研究的格局，在内容主体上可分为三类，即中国哲学的阐述，西方哲学的介绍和哲学体系的创立。这十位哲学家大都建有自己的哲学体系，有些虽未建立明确的哲学系统，但其对哲学史的研究亦体现了他们的哲学态度和哲学立场。无论如何，这些哲学家的著述，或具有对中国哲学的精湛研究，或具有对外国哲学的透彻了解，或建立起自己特色鲜明的哲学体系，都在哲学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堪称为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经典之作。这些现代中国哲学的经典之作，无论是哲学史的研究，还是哲学体系的建立，在 20 世纪世界哲学的相应领域中都达到了一流的水平。回顾这些 20 世纪哲学经典之成就的取得，有两点十分突出：第一，现代中国哲学的哲学研究，无不以西方哲学及其发展历史为参照的背景。从欧美留学归国的学者自不必说，即使最具传统特色的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他们的哲学问题意识也都受到西方哲学观念的深刻影响。西方哲学是人类智慧中理性分析和建构的精致代表，西方哲学的形态虽属特殊，但其中不少问题的讨论是具有普遍性的。西方哲学的论述虽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根本规定，但西方哲学已经成为现代哲学学科的基础，学习西方哲学可以为研究其他哲学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方法。而深入了解西方哲学和世界其他哲学，将促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哲学传统。第二，现代中国的哲学体系的创制必须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建立积极的关连。正如陈寅恪所说，“窃

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果亦当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熊十力的新易学、梁漱溟的新儒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金岳霖的新实在论、张岱年的新唯物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自觉地与中国古典哲学相接应，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相结合，20世纪在构建哲学体系上卓有成就的中国哲学家皆是如此。

本系列的编辑，缘起于吉林人民出版社的策划，而委托我来加以组织。今年2004年是北大哲学门成立90周年，精选北大哲学系的著名哲学家的重要作品并编辑为系列，不仅可以作为对北大哲学门90周年的纪念，也是对20世纪中国哲学成就的总结展示，对21世纪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亦可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应当说是很有意义的。我接受这一工作后，根据出版社先编辑中西哲学部分的意见，即选定十位已故的曾任教北大哲学系的哲学家，邀请了专门研究这些哲学家的专家参与合作。他们是：胡军教授、李存山教授、张学智教授、景海峰教授、欧阳哲生教授、孙尚扬教授、黄夏年教授、韩林合教授等。他们对所编的哲学家及其著作，素有专深的研究，他们欣然接受我的邀请，放下手中的研究工作，共同努力，使得“北大哲学门经典系列”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编辑完成了。对他们的大力协助和有效工作，我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系列的编选尽量以突出其哲学思想为主，名著和名篇并重。编选力图与已有选集有所不同，体现出编者独到的选读眼光和安排构思，从而使得本系列在突显这些学者对20世纪中国哲学创作与研究贡献的同时，亦以提供本系列编者的独到解读为特色。

本系列的编辑还得到了北京大学“十五”“211”工程计划的支持，也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陈 来

2004年12月20日

前言

在20世纪中国哲学领域，真能立定一家之言、根深叶茂而又风被后世的，实不多见，熊十力当属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新唯识论”体系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独树一帜，而且为现代新儒学的萌发和生长奠定了形而上的哲学基础，因此，他被学界称作是“五四以后最有成就的专业哲学家之一”，^①也是世界公认的现代儒学大师。

1885年2月18日，熊十力出生于湖北黄冈上巴河之张家湾一个农民家庭。从他的曾祖父起，熊家“三世皆单丁，都无立锥地”，家境极为贫寒。^②他的祖父务农兼做木匠活，在完工后结账时常常受人欺负，深感到不识字之苦，便节衣缩食，送儿子入乡校就读。他的父亲熊其相，“好研历史”，不事科举，终身未仕，做了一辈子的乡村教书先生。熊十力儿时，父已深染肺疾，举家乏力，衣食不给，才八九岁，便不得不为邻人牧牛，也时而向父兄学几个字。10岁时，父亲“强起授馆，带之就学”，教以《三字经》和“四书”。^③可惜仅年余，熊老先生便去世了。在这之后，熊十力基本上是务农田间，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拜在邻县圻水何圣木门下读书。

1902年，年仅17岁的熊十力“图革命，旋入武昌兵营当一小卒”，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反清革命，奔走呼号，联合有识之士，发起成立黄冈军学界讲习社，参加日知会，经历了辛亥风云。武昌首义成功，熊十力欢欣鼓舞，意气激昂，意有所为。但时过不久，袁世凯大权在握，排挤革命党人，在武昌大肆捕杀辛亥志士，熊十力亦

① 冯契：《〈新唯识论〉的“翕辟成变”义与“性修不二”说》，载《玄圃论学集——熊十力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1990年，第115页。

② 熊十力：《先世述要》，《熊十力全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八卷（论文集札），第868页。

③ 熊十力：《十力语要》卷三，《熊十力全集》，第四集，第424页。

亡命江西德安。“忽起念云，哀哉！人生乃如是耶？怆然欲泣”，一下从希望的高峰跌入了失望的深渊。护法运动失败后，熊十力“忧世之思深，愤世之情急”，更陷入了巨大的苦闷和彷徨，“念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自始“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遂脱离了军政界，决志于学术一途。^①

1918年，熊十力的第一部著作《心书》问世，这是他历年所存笔札的辑辑。蔡元培所作序云：“今观熊子之学，贯通百家，融会儒佛。其究也，乃欲以老氏清净寡欲之旨，养其至大至刚之气。”这种广博通灵、不拘一格、视野开阔、立论宏大的风格，成为熊十力一生治学的最大特点。此时，在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的熊十力因在《庸言》上发表文章，批评佛家，而与梁漱溟打起了笔墨官司。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况下，两人便一同赴南京支那内学院求教于欧阳竟无先生。后来熊十力便留在了内学院学习，首尾共3年，系统攻读了大乘有宗的经典，并写出了一部唯识学的稿子。1922年，他被北京大学聘为特约讲师，在哲学系开设唯识学课程。熊十力到北大任教和梁漱溟的推荐有关，梁自己循守家法，生怕错会了佛家原意，才延请了一位内行来接替自己的教席（在这之前，梁漱溟曾开设唯识哲学一课）。没料到，熊十力才气横溢，不拘家派，深研佛家唯识却不因袭之，和梁自己的风格完全不同，这一点使之颇感失望。^②熊、梁交谊深厚，非同一般的朋友，其后又被共尊为新儒家的开山人物，但他们的学术旨趣和人生轨迹实有很大的不同。二三十年代之交，正当梁漱溟走曹州、下南粤、赴辉县、去邹平，忙碌于社会实践，苦心经营乡村建设运动之时，熊十力却沉潜于书斋，历十年之功，反复涵泳，易稿无数，写出了他的传世名作——《新唯识论》。

《新唯识论》问世后，引起了内学院师友的不满。欧阳竟无授意刘定权作《破新唯识论》，熊十力以《破破新唯识论》答之，张旺前说，立论愈坚。太虚、周叔迦、印顺、王恩洋、吕澂等也纷纷著文，加入了论战的行列。这样，围绕着《新唯识论》所展开的争辩，便成为中国

① 熊十力：《尊闻录》，《熊十力全集》，第一卷，第659页。

② 梁漱溟：《纪念熊十力先生》，载《玄圃论学集——熊十力生平与学术》，第25页。

现代佛学的一大公案。^①抗日战争期间，熊十力避难入蜀，先居璧山，后栖北培。曾应马一浮之邀，赴乐山复性书院担任过短期主讲，亦曾协助梁漱溟主持过一段勉仁书院的工作。但他于颠沛流离、艰难困苦之中花费主要的精力改写了他的《新唯识论》，由文言文翻作语体文，使“新唯识论”体系更趋圆熟。同时，他又写了《读经示要》一书，编定4卷本的《十力语要》，使其新儒学思想系统更加完备和博大。抗战胜利后，熊十力仍返回北京大学任教，后又应邀到浙江大学做短期讲学。

新中国成立后，熊十力仍然保留了北大教授的名义，享受一级教授待遇，直到1958年方解除。但这期间，他并未到校上过课，大部分时间都在闭门读书和写作。50年代初，他先后写了《摧惑显宗记》、《与友人论张江陵》、《论六经》等三本著作。又将《新唯识论》重新删简改写，采文言文文本之精粹和缜密，集语体文本之博大和灿然，堪称是该著的最佳定本。1954年，熊十力离京赴沪，依子世菩居住。时年事已高，心力不济，又数种疾病缠身，然他置生老病死于度外，读书尤勤，著述更力，未尝一日废学停思，以残年病躯继续宏大事业，完成未竟之功，先后写就《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存斋随笔》等五部著作。文革爆发后，熊十力的身心受到摧残，1968年5月24日，病逝于上海寓所，终年84岁。

综观熊十力一生经历，约略可分为5期：17岁赴江汉，投身革命以前，随父兄耕读，艰难困苦，聪慧早熟，备尝生活艰辛，同情劳苦大众，身居社会下层，造就叛逆性格，此为第一期（1885—1901）。投身反清革命，创办讲习社，参加日知会，辛亥首义后，又奔走于两广、鄂赣间，参加讨袁护法，共历时16年之久，此为第二期（1902—1917）。护法失败，念党人竞利终无善果，怆然有人世之悲，遂转向学术一途，问学于欧阳竟无大师，深叩内典，专攻唯识，及讲学北大，由旧学萌发新见，自创体系，写出《新唯识论》，此为第三期（1918—1932）。自《新唯识论》问世，渐渐旧根，愈张新说，推出众多辅翼著作，驳倒无数论敌文章，使体系日趋缜密成熟，立定一家之言，此为第四期（1933—1949）。最后20年，整理旧学，提炼总结，老当益壮，著述颇丰，学术思想更完备，“新论”体系更博大，此为第五期（1950—

^① 参见拙著：《熊十力》第三章之三“现代佛学的一大公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第100—118页。

1968)。

二

作为现代新儒学形而上的奠基者，熊十力的哲学充分吸收了我国儒、释、道各家思想的精华，对易学传统、理学和心学体系、大乘佛教空有二宗、老庄思想，均有程度不等的吸纳和改造。同时，他也借鉴和吸收了西方哲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将之融会到自己独创的思想体系当中。在对这些思想资源进行筛选和改造的过程中，如何转化传统以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又如何参照西方的典范以改铸中国的传统，便成为他哲学思考的焦点。

(一) 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重镇

毫无疑问，熊十力哲学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的，他本人也是以传统文化维护者的面貌出现于现代思想界的。近代中国文化千疮百孔的颓势和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主义所引起的震惊，长久萦绕在他的心头。如何“调整并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去粗取精，批判地继承，“以应新时代”的需要，是他探玄论学的重大关注点。熊十力认为，传统文化经过两千年专制的毒害和历代“奴儒”苟且利禄之心的腐蚀，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生命体验和超越意识；特别是经过近代西潮的冲击和激烈反传统主义的无情打击，更是气息奄奄、垂垂待毙。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所具有的自尊自信也差不多丧失殆尽。面对这种衰局，如何树立民族自信心和重建中国本位的文化就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他不满近代改良派“一方言大同，一方又谋复辟”的挽歌情调，对革命派“东涂西抹，浮浅混乱”的无本无根亦深感到焦虑。^①认为新的中国文化只能以经过批判改造后的传统中国文化为根底，然后融合西方文化，创建植基深厚而又有中国特色的体系。对传统文化，他反对全盘弃绝，认为中国社会经两千年停滞不进，如“久病之夫”，只有“掘发其固有宝藏，涵养其自尊自信之毅力”，如良医“谨其攻伐而善护其元气”，才能“消其郁滞，则痼疾自除，而生命力乃日益充沛”。“若遇医师缺经验者，将横施攻泄，大伤根底，病夫立毙，可哀孰甚”。所以他对“清末以

· ① 熊十力：《原儒》上卷，《熊十力全集》，第六卷，第447、443页。

来，国人恒自卑，视固有学术都不成为学术”，“五四运动以后，菲薄固有，完全西化之倾向，窃有所未安焉”。^①他认为，东西文化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应“观其会通，而不容偏废”，对“中学精意随其末流之弊，以俱被摧残，如蒜精之美不幸随其臭气而为人唾弃，因是惶惧”。^②

熊十力对传统文化所抱的“好自护持，毋令断绝”的心态，并非完全出自文化守成的意愿和欣赏历史传统的怀旧，更不是仅仅基于对激烈反传统主义极端主张的意气之愤；而是出于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因理论根基薄弱而不能挺立自主、最后归于失败的切肤之痛，以及对残败不堪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适应世界潮流、完成现代转型的深深忧虑。他认为，“清季革命思潮从外方输入，自己没有根芽。当时革命党人，其潜意识还是从君主制度下所养成之一套思想，与其外面所吸收之新理论，犹不相应”。所以造成了肤浅混乱，“士习学风江河日下”，专制主义的幽灵长久徘徊不去，西方科学民主真正有价值的新知扎根不下的困局。如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理智而深刻的反省，肃清专制主义的遗毒，吸收顺乎世界潮流的西方新知，为“同情天下劳苦小民，独持天下为公之大道，荡平阶级，实行民主，以臻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盛”的现代理想奠定自本自根而又宏阔坚实的理论基础，^③是熊十力寄望于传统的真实意义所在，也代表了他探寻古老的中国文化之未来出路的独特追求。

在熊十力看来，近代中国的真正可悲不在于它的经济落后和物质贫乏，而在于本根良知的泊没和民族自尊的丧失，对西方的学习，需要一种自主自立的思想气度、一种超越现实功利的意愿和一种敢于正视人类存在深层意义的勇气，而这些正是近代知识分子所缺乏的。在西潮的冲击下，抛却自我、丧失自信、随波逐流，正是造成近百年来思想界贫乏、浮浅、混乱、杂芜和社会“无生人之气”的根本原因。他批判当时对西学奴化心态的崇拜和支离破碎的了解，认为这只能造成旋生旋灭的时流风尚和只及皮毛的虚夸竞浮，而对于真正理解西方文化、吸收西学精华则毫无益处。熊十力强调，对自己民族的自信和对传统文化的自

① 熊十力：《十力语要初续》，《熊十力全集》，第五卷，第22—23页。

② 熊十力：《十力语要》卷一，《熊十力全集》，第四集，第110页。

③ 熊十力：《原儒》上卷，《熊十力全集》，第六卷，第443—450页。

尊是迎接世界潮流、吸纳西方学术的首要前提，如果自贱自戕，丧失了重振雄风的信念和迎头赶上的勇气，只是一味地唉声叹气、低眉顺眼地扑伏在西方的脚下，那么中国文化就永无矗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时日。

（二）对佛教唯识学的创造性转化

熊十力对佛教唯识学深有研究，《新唯识论》即是从《唯识学概论》脱胎换骨而来。^① 他的思想体系不但与唯识学在学脉上有着甚深的缘结，而且与中国近代的唯识学复兴思潮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近代佛教唯识学重振的背景，便不会有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正因为熊十力能打破门户之拘，不以涉佛为讳，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佛法，于佛教唯识学作了深入的了解，具有了相当的学养，才使得他的学说能真正地吸收佛家哲思的菁华，而超越了前人之先入为主、比附拉杂的融合儒释的老路。就熊十力研究佛法的特定机缘和对佛学理解的深入程度而言，在他之前的思想家是无法与之相比的，这正是他超出宋明儒以及近代诸思想家的地方。

但是，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与佛教唯识学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在全面地批判和扬弃旧唯识学的基础上，融会了佛学、易学、心学的内容，经过现代翻版之后而具独创性的哲学体系，并非只是局限在唯识学范围内的简单改作。所以，“新唯识论”显为近代唯识学复兴思潮中斜逸而出的一支，与南欧（阳竟无）北韩（清静）的“唯识学”及太虚法师的“唯识新论”等，都有着根本的不同。从学术客观化的角度来看，就像蔡元培所分析的那样，熊十力的出佛返儒，实际上也就是由宗教家到哲学家的转折。^② 正因为如此，他能以一个非信仰者的立场和心态来反观佛法，涤除其宗教观念，而挖掘和会通其哲学思想，对唯识学做出了深刻的理论反省和前无古人的大胆改造，使得这沉埋千载的古学在现代哲坛放出了一道异彩。

熊十力由佛转儒，对唯识学所作的检讨，不只是一种学派立场上的改弦易帜，而实在是出自理论内容本身的一次深刻蜕变。这一转变的理

① 参见拙著：《熊十力》第二章之三“从《唯识学概论》到《新唯识论》”，第63—74页。

② 蔡元培：《〈新唯识论〉序》，《蔡元培哲学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14页。

论意义，不仅仅在于从人生观层面彻底地否定了佛教的出世主义，从而确立了精进健动的人生理想；而更在于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对佛教出世主义的理论基础作了深入的分析 and 批判。所以冯友兰指出，熊十力的由佛返儒比他以前的哲学家“多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又回到佛学，清算了佛学中的一笔老帐，澄清了佛学中的一个问题”。^① 陈荣捷亦认为，熊十力对佛学所做的“长篇累牍而又严密深刻的批判”，实在是“中国历史上这样做的第一个人”。^②

熊十力对唯识学的“反叛”，并不是简单地抛弃之，而是站在儒家传统的立场，融合空宗和中土禅、教的思想，对其进行彻底的改造，使之趋向于中国化。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唯识论》又是一部用中国传统思想熔融和改造印度佛学（主要是大乘有宗）的著作，而“新唯识论”不过是唯识学的中国化而已。熊十力首先融合了空有二宗，对中观思想加以吸收和发挥，用空宗来破除有宗的弊端。继又以《周易》的生化观来纠正空宗的“耽空滞寂”，以儒家立场综汇空有（宗）。其次是广泛地吸收了中土禅、教之成果，尤其是华严宗和禅宗的思想，其本体论即深受华严思想的影响，而在认识论方面则多得益于禅宗。最后，他的思想落脚在儒学，对唯识的改造最终归本于《大易》。熊十力融佛入儒的出色处，即在用易学本体论成功地融会了唯识学的宇宙构造论和辩证法，从而使印度佛教大乘有宗的学说进一步地中国化。实际上，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思想文化，从它传入开始，便经历着一个被中国化的过程。在熊十力的唯识学研究中，充满着积极的创造性的转化意识，总是力图把唯识学的内容和中国传统的思想结合起来，尤其是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强大生命力而长盛不衰的因子来改造和消融唯识学中那些不适应中国民族性特征的成份。他的这一努力正是继续了前人改造印度佛学的未竟之业，试图在近代唯识学复兴的大背景下，来完成唯识学的中国化。

熊十力对唯识学的改造也深深寄寓着振兴中华文化的苦心和重建中国哲学的宏愿。面对传统文化大厦已覆而残象可哀的情景，他所致力就是要扶其本根，从本体意识上重树中国文化的自尊和自信，他的

① 冯友兰：《怀念熊十力先生》，载《玄圃论学集——熊十力生平与学术》，第31页。

② 陈荣捷：《熊十力的新唯心主义儒学》，载《玄圃论学集——熊十力生平与学术》，第21页。

“由佛转儒”的思想蜕变和从根本上对佛教所作的批判，都是围绕着这样的信念展开的。所以，佛学和其他传统学术一样，只不过是整合和重构中国文化核心精神的一个凭借。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佛教在西潮的冲击下，同样也栖身艰难、濒临绝境，是否只能甘愿沦为“古董”而供后人做解剖式的研究之用，还是尚有一线生机融合于某种新的文化精神之中而得活泼泼地生存下去，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同时，在中国文化的重建过程中也包含着佛学的现代转化问题，而传统的中国佛学有它自身的特点，如何在这一转型中尽量地保持并发挥它的长处，也是能否完成一种有生命力的嫁接工作的关键。所以，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正是在这些方面做了大胆而有益的尝试，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内容。

（三）“体用不二”的本体论构造

熊十力穷其毕生精力从事于本体论的创造，他的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本体论，而其本体观又是以“体用不二”为纲宗的。在阐发这一理论时，他考证儒释，衡论中西，董理旧说，清除杂冗，对古今中外的体用观念做了一次全面而彻底的清理和批判。他认为中外哲学家的本体观念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三大谬误：一是求绝对于相对之外，二是无体之论，三是以用为体。而这些错误都是因为割裂了体用的关系，将体用看做二事，“执用失体”或“离用求体”所致。^①所以，他坚主“体用不二”。体用不二即如大海水与众沤的关系，实体与功用、根源与现象是相互变动的动态整合过程，既不能离开现象来把握本体，也不能抛却本体来说明现象，二者是既分而又实不可分的关系。

熊十力对“体用不二”的论证大致包含了这样四个层面：以空破除一切实体观念，扫相证体；以“翕辟成变”为枢机，于大化流行之中识体；即用显体和摄体归用。

首先是空体。所谓空，并非虚无，而是以空破除本体意识中的一切实存观念，由辩证的否定达到泯绝体相和对体用一如的深刻理解。证本体空寂，熊十力受到大乘空宗“破相显性”的影响，亦吸收了“缘生”、“刹那生灭”等佛家意。正是巧妙地运用了这些佛教理论，他深入地分析和说明了本体的非实存性，清除了旧形而上学的实体观念。他

^① 熊十力：《明心篇》，《熊十力全集》，第七卷，第305—306页。

深厌用外求体、将实体看做是超越万有之上的绝对存在、求绝对对于相对之外的宗教锢习，惟恐破斥不尽而重蹈覆辙，所以大施攻诋、随说随扫。但彻底的空观又有流入虚无主义的危险，所以熊十力的本体观表现出了真实与虚幻的矛盾之境：肯定现实世界的真实性是倡扬精进健动之人生理想的基础，这也是他弃佛返儒的真实意义之所在。为了杜绝悲观厌世的绝对之虚无，必须树立起实存的信念，对现象界有所执取。但痛感于近代资产阶级在理论上的混乱、浮泛和形而上本根的缺失，他又不得不破字当头，把定一种哲学上的玄远追求。在永恒与历史之间，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在超越的理智创造与尘俗的情感抉择之间，熊十力进行了十分艰难的调适。他力图在这吊诡而困苦的担当之中寻求一种平衡，既要达到“迥脱根尘，体露真常”的高深理境，又要不流于虚无以及消解掉理论创造的现实意义。

其次，熊十力用《周易》大化流行的宇宙观来补救空宗一往破尽、体归寂灭的缺失，提出了“翕辟成变”的理论，成为其本体论的核心。翕辟义，源于《易》、《老》，后经王夫之等人的发挥，用作气论和阴阳大化的形象说明。熊十力继承了前人的某些说法，并加以翻新，使翕辟说成为其描绘动态的、历程性之本体的主要理据。本体之变化即显现为翕和辟这两种势用，宇宙万物的生灭“只此翕辟之流”，离翕辟，则无所谓本体，无所谓宇宙，所以本体即翕辟。^①熊十力的翕辟大化论以流行变化的观念来论说本体，将本体描绘成一舍故取新、变动不居的过程，这个过程无始无终，无消歇，无滞留，既是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据和样态，也是我们认识和把握现象界的唯一背景场所。本体即流变，而非实存，这是对实体化形而上学的突破，就这点来说，熊十力的本体论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颇有些相像。

第三，即用显体，因为本体流行即全显为万殊的大用，用外无体；用是体的完整显现，离用无从识体；所以只能从相对中认识绝对，从现象中把握本体。

第四，“即用显体”肯定了体用关系之中现象界实为主导的方面，对现象的认识和把握，既是辩用，也是明体。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过渡到“摄体归用”的层面，将本体含摄于万殊的大用之中，销体以归用，用外本无体，本体与现象界达到了完全的合一。这样，熊十力便完

① 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熊十力全集》，第三卷，第255—256页。

成了体用不二的逻辑论证，建构起了他自己的本体论体系。

(四) 独具特色的“量论”

熊十力草创《唯识论》讲义时，即依佛家之“能所”作“境”、“量”二论之企划，但从最早的《唯识学概论》（1923）到《新唯识论》（文言本），均只包括了部甲境论，而部乙量论却始终没有写出来。后来，他改写《新唯识论》时，干脆就取消了境、量的名目。尽管《量论》这部著作久蓄于熊氏的胸中，甚至到了晚年还念叨不已，但终究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字，这就不免令许多人感到遗憾。实际上我们分析后就会发现，熊十力写出的境论部分并非只是谈本体，而是糅合了各种知、情、意的心理认知内容。这样一来，其量论部分也就很难再从这一浑沦的状态之中充分地剥离出来，而自成一个大的系统。熊十力本人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改作《新唯识论》时，就不再构画境、量二分的轮廓，而是强调本体论、宇宙论和知识论三者的“混而为一”。

熊著之中于量论构画最详者，莫过于晚年的《原儒》一书。在该著上卷的“绪言”中，作者对“早有端绪”的《量论》作了一个大纲式的描述。^①这部书拟分为“比量”与“证量”二篇。比量即“依据实测而作推理”，以求得知识。证量意谓求诸本心，自明自了，默然识之。比量篇复分上下，上篇论“辨物正辞”，阐发先秦诸家之名学思想；下篇论“穷神知化”，以辩证法通变化之道。证量篇专论“涵养性智”。所谓“性智”，即“止息思维，扫除概念，只是精神内敛，默然返照”，从而达到泯绝物我，“思修交尽”，“浑然与天道合一”的境地。熊十力最初对境、量二论的企划即是立足于佛教唯识学的体系，而“量论”构想基本上是从陈那他们的学说引发出来的。但从一开始，他又并未完全遵循着唯识学量论的框架，而是作了一定的改造。随着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和吸纳，以及心学内容的大量引入，这种分离就越来越显著，以至于到后来他所说的“量论”，根本就不是佛学原意上的了，而是指一种广义的知识论，涵盖了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心理学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比量上篇之“辨物正辞”，相当于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思维活

^① 熊十力：《原儒》上卷，《熊十力全集》，第六卷，第315—326页。